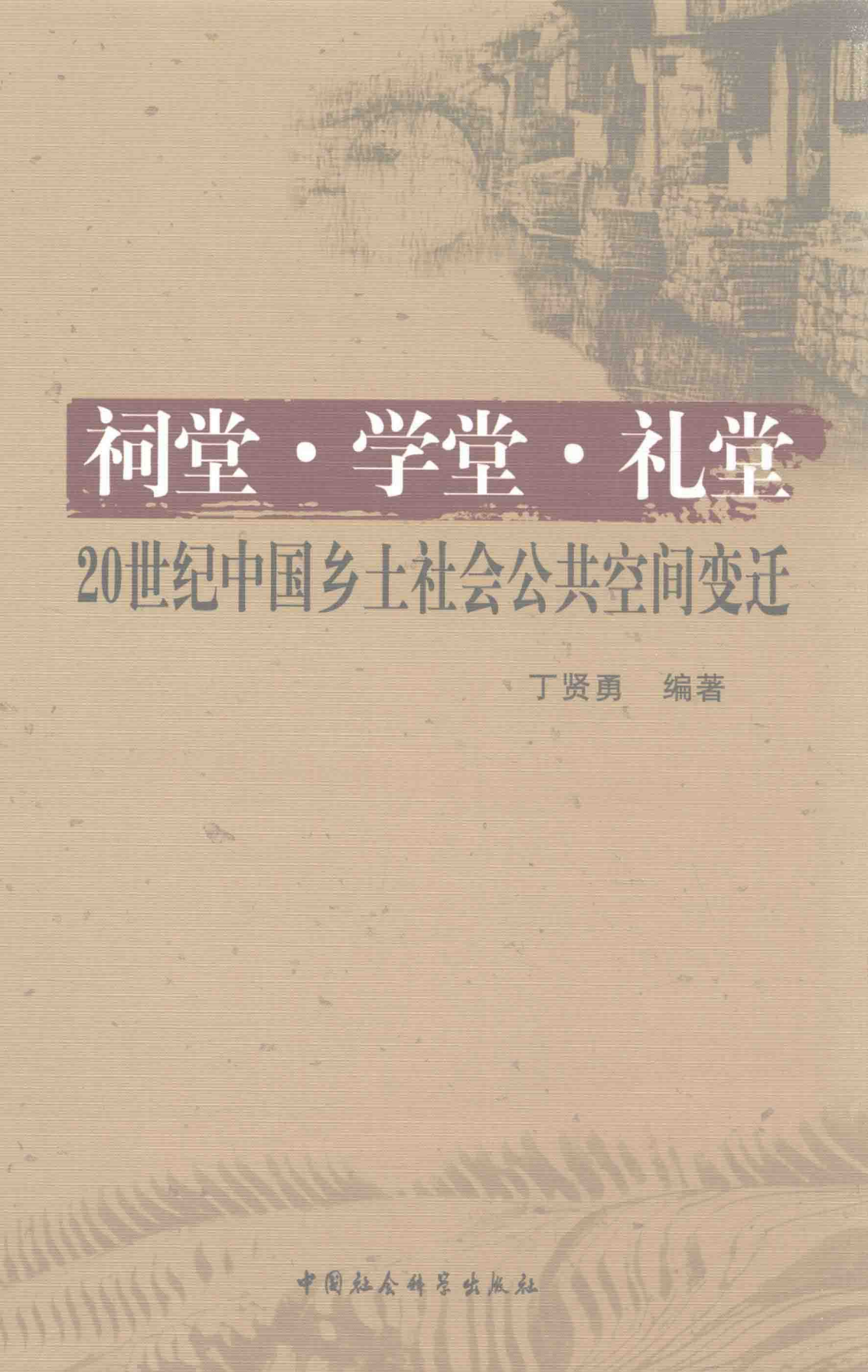




祠堂·学堂·礼堂

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

丁贤勇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祠堂·学堂·礼堂

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

丁贤勇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祠堂·学堂·礼堂：20 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 / 丁贤勇编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5
ISBN 978-7-5161-8522-3

I. ①祠… II. ①丁… III. ①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C912.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83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25
插 页 2
字 数 526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成果



序 言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袤的乡村世界，也在时代的洪流中，不自觉地经历着巨变。这种变迁，反映在乡民日益丰盛的餐桌上，反映在拔地而起的新居间，也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含在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变化之中。

公共空间，是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里衍生而来的概念。狭义上，它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工作、学习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它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从形态或者建置上看，它们有封闭式的，有半开放式的，也有完全露天的。广义上的公共空间，它不仅仅只是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到特定空间的人，以及展现在这些空间之中的参与、交流与互动。空间中的人才是公共空间的主体，缺失了“人”，便谈不上什么公共，也就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了。空间中的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间或掺入些许与经济挂钩的行为。

乡土社会公共空间，是近十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一向只认为公共空间是城市的事情，它源自古希腊城邦的‘阳光广场’，殊不知，在农耕的中国，也自有其另类的公共空间。”^①而“谈论中国的公共空间，必须区分城市和乡村。”^②乡村公共空间是一种“乡村中面向所有村民全天免费开放的户外场所”。也有的认为乡村公共空间是“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的结合，强调的是一定社区内的

① 孙振华：《广场操练》，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1 页。

② 李华伟：《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 豫西李村教会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7 页。

公共精神、归属意识，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外在属性的文化范畴。”^① 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古希腊城邦、现代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有所区别，它不仅免费给予大致以该空间为中心的同心圆为一定范围的村民物质上（包括场地、基础设施等）的支持，而且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一个范式，形成一种文化认同感，从而显现出“人以群分”的乡土格局。

《说文解字》中，“公”，平分也；“共”，同也。“公共”是指平分而共有，即公有的，公用的。在古代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个角度看，“公共”似乎并不存在。其实不然。自古及今，民众不管身处何种政治环境之中，都会开辟出独有的公共空间并参与到属于自己的公共生活中去。

在乡村，溪河旁、大树下、木桥头、水井边、晒场上、庙宇中、集市上、茶馆饭铺里等，均可能形成为公共空间。按照用途的差异，乡村中多样化的公共空间大致可分为：主要从事祭祀娱神、唱戏娱人等活动的神异性公共空间，进行日常生活、生产和学习等交互和交往活动的日常性公共空间，用于处理公共事务、举行政治集会的政治性公共空间。^② 本书所探讨的祠堂、学堂、礼堂便是上述三类公共空间的代表，它们所限定的空间范围，是真正意义上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体现。

学界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大多以某一地的某一村为例，所选定的村落一般是很典型的，往往具备一些特别属性，可以满足论证的需要。而本书从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出发，通过几乎是随机产生并采写完成的 40 篇访谈报告，记录并探索 20 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中共性的、深层次的内容。祠堂、学堂、礼堂作为一类特定场域，通过对它们历史沿革的把握，以了解普通民众是怎样参与到区域集体生活中去的，他们的精神、情感又是如何受其影响的，从而阐释 20 世纪中国乡土社会、村落、族群，从传统的血缘式的“家族社会（或宗族社会）”向现代地域式的“公民社会（或人民社会）”的重大转变，其间国家力量又是如何发挥其作用并促进其转变的。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① 何兰萍：《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② 王玲：《村庄公共空间：秩序建构与社区整合：以川北呈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 年。

—

祠堂，是族人祭祀先祖的地方。因此，祠堂往往与宗祠、宗族相联系。“宗”是尊重的意思，“族”指的是聚合的、相互恩爱的、包括从高祖到玄孙几代人的大家庭。而所谓宗祠，就是某一姓氏宗族在某一村定居繁衍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单姓或者主姓村落后，由族众建立的祠堂。从商周的宗法制开始，国人对血缘关系有一种特别的“迷恋”。而因此演变出的祠堂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它始见于战国，两汉时发展为墓祠，魏晋至隋唐中期中断，宋代又出现家祠，元以后出现祭祀群祖的祠堂。明清以后，祠堂就成了宗族的象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祠堂作为“特定人群”的公共空间，既是“族权”的象征，同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祠堂具有诸多功能：一是颂祖。通过祠堂宏伟的建筑和华丽的装饰歌颂祖先的大德，以尽忠孝之心。在采写过程中，章建忠“章氏家庙的雕梁绣户”、杨鑫烨“半千岁月，芦根绵长”均有相关介绍。二是贴金。记述祖先荣耀也等于在后代脸上贴金。陈杰“一门六进士”、陈佳文“安昌望族，名人辈出”、余佳蔚的泗门谢氏的来历、游可的塞源游家得名等小故事，还有各式各样的匾额可为例证。无疑人们记述祖先的功绩往往会有所放大、夸张甚至虚假“故事化”的成分。三是收族，凝聚团结。“祠堂作为原生性空间的意义在于祭祀崇祖，而作为次生性空间则在于聚集人群。”^①四是巩固宗族的统治，维护宗族的秩序。族里的奖惩事务也在祠堂里进行，张琪“一面大鼓，威力无穷”中专门进行讲述。五是精神支柱、宗教信仰活动的场所。宗祠里往往会有形式多样但同样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六是祠堂修家谱或族谱以传承家史。除了以上的社会和教化功能，祠堂还有文化、教育和经济功能，一些宗族从“学而优则仕”出发，大力倡学，创办私塾，培养适应科举制度的人才，以期有朝一日进士及第，以光宗耀祖。

20世纪前，虽然祠堂在乡土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并非是个温馨的场所，反倒会有血淋淋的家族故事，也有冷冰冰的中国式伦理和血缘尊卑：男尊女卑、家族国家化、国家家族化——我们在诸多书籍、影视作品中时常会见其踪影。然而，这一延续千年的稳定性状

① 王静：《祠堂中的宗亲神主》，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态，在剧变的 20 世纪里已逐渐发生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各种政治力量相倾轧，反而形成某种均势，对乡土社会的这种“长老权利”的统治并未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宗族制度逐渐被强大的政权力量打散。先是从经济上对祠堂的经济基础进行破坏，即收归族田（包括祠田、学田、坟田等），余曼飞就详细地描述了“祠田划分”的过程。接着是通过以政治支持的“暴力”手段进行损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改革开放以后，“左”倾思想得到纠正，通过宗族文化的复兴，对社会基层乡村思想进行“整顿和恢复”，因而掀起了一股翻新和修复古祠的热潮。汤雨曦“重修陈氏祠堂记事”等记载中的妙山陈氏祠堂以及磐安樺溪孔氏家庙、畝田蒋氏宗祠、慈溪孙家境祠堂、龙湾张璁祖祠等，均被列入国家或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就是政府主动着手重修乡村祠堂；有的在乡村干部的带领下进行修缮，也算是一种“官民合作”；但大多还是族人自己筹资进行修缮，郭孝洁、胡燕晔、徐燕芳采写的祠堂均为此类情况。无论是哪种方式，重修祠堂均以政府许可为前提。当然，乡村中更多的祠堂就此落下帷幕，被弃置坍塌或者移作他用，只于断壁残垣间悄然诉说着往日的光荣与梦想。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整体的凝聚力减弱，传统文化领域受到冲击。乡村祠堂开始一些“返璞归真”的活动：祭祖活动得到允许，只是少了一些迷信色彩，祭祖的仪式和程序也更为简单、实用和现代。更多的是举行偏向于“成人仪式”型的祭祖活动。这样，用宗法的“形”传达寄托哀思，弘扬尊老爱幼、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的“质”，祠堂成了联结宗族的亲情纽带。以上种种，又是新时期国家在思想领域、精神层面对“公民社会”的建设。

如果说祠堂是偏向于传统社会政治领域作用，那么学堂则侧重于近代乡村文化影响。学堂，是近现代对新式学校的称呼。本书指晚清、民国时期，包括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学校，涵盖了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绵延百年的新旧过渡时期。如早期曾出现过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时务学堂，以及清华学堂等著名学堂。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令“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①，但民间依旧以学堂称呼新式学校，今天在乡村老

^① 《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第 32 号）》（1912 年 1 月 21 日），《浙江军政府公报》第 17 期，1912 年 2 月 15 日。

一辈人中依旧保存这样的称呼。学堂区别于古代的私塾，因为有更强的公共性；也不同于现今的学校，其带有很明显的小集体所有和非普及化的特征。它们相对古代私塾是新的，相对现今的学校又是旧的。

本书的着眼点是在广大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学堂。其总体特征包括：校舍是不正规的，往往利用旧有的建筑，比如寺庙、祠堂、仓库、礼堂、大户人家的房子等；教学也是不正规的，学生大多半工半读，劳动多，运动多，而且是非义务教育；乡村师资同样是不正规的，教师大多没接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学历，没有事业编制，往往过着半耕作半教学的日子。

20 世纪初的私塾与学堂，体现了当时教育的过渡性，更反映了政治的动荡和新旧时代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前后，学堂学生依旧是限制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大多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努力上进，有的则自由散漫。那些认真苦读的学生多是有家学传承，或生活更加艰难的。在乡村学堂里，学习的内容较少，层次较低，多为称之为“初小”或“高小”的小学教育，所学门类仅是语文和算术等。杨鑫烨、项淑玉、蔡蕾、吴晶、张静等的采写中，都有对学堂生活的生动描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堂作为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教育上和思想上对传统进行涤荡。柳燕楠“百年树人，后堡学堂尽沧桑”记录了一所百年祠堂遭受的“人祸”。鲁超杰“五七指示办学”，揭示了政治对学堂的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高校招生与中考、高考相连的国民教育得以全面开展，加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先的学堂大多被废弃或者改造，新的学校逐渐建造起来，有些还成为当地乡村标志性的建筑。在新的学校里，孩子们接受的是全新的、现代化的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方面都有极大的变革。这在郭孝洁“九旬老人之学堂亲历”中就有涉及。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趋势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正面临外来文化的渗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衍生出的非正面的文化冲击。为了使孩子们不忘本、不忘根，国家又重新依托旧祠堂、旧学堂等传统公共空间传承优秀文化、弘扬优良品德。如在旧祠堂和学堂进行爱国主义、忠孝道德教育，举行成人仪式等。

礼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是举行典礼的厅堂，用于行礼、集会、娱乐的场所。古代的“明伦堂”、祠堂的正厅，也可以看作是原始的礼堂，

或者说具有礼堂的功能。到了近代，基督教教堂中的“礼拜堂”成为民众认知“礼堂”的直接来源，如早在1873年的上海，中国教徒在礼拜堂以西礼进行结婚，还被指为“忘本”。^①但是，中国传统婚礼称之“拜堂成亲”，拜堂就是行礼，现在教徒在礼拜堂举行婚礼，两者均在堂上有礼有拜，这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嫁接成功的一个点。1918年，在北京有绅商为“首善之区”之文明结婚，建造专门的结婚礼堂。^②近代新式学堂产生后，礼堂成为学堂内的一种设置。如1909年绍兴府中学堂要求筹款建筑礼堂、特别教室等。^③进入民国后，礼堂成为教堂、学堂、机关、团体、企业等的标准配置之一。1937年闽省一所小学校的礼堂布置：“正中悬有同样的总理遗像二，一上一下连接着。旁贴训育标语多张，其中的一张我还记得，其文是：‘儿童的天真是烂漫的呀，伟大的呀！’”^④

在乡村，早在1922年就有人提出在市镇集合大家的力量建设礼堂，要求“初不必十分壮丽也，地基高爽，屋舍宽大，足以容多人可矣”，认为其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作为“行结婚时之礼堂”以“提倡新式婚礼”，作为“公共讲演厅提倡社会教育”和作为“通俗剧场”以“改良风俗感化人民”。^⑤1928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秋季评议员会上王云五等人提出计划筹资1500元，在昆山县徐公桥改进乡村试验区民众大礼堂，重新“建筑朴雅适用大礼堂一所、并附设民众娱乐及借贷合作社医药室等”^⑥。将乡村礼堂建设付诸实施。近代礼堂成为举行就职仪式、成立大会、学术讲座、业务培训、婚庆典礼、追悼大会、设筵宴请、游艺比赛、曲艺表演等各种集会庆典的活动场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情形发生了变化。1951年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政治工厂即政治运动、政治集会的大礼堂。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进入集体化时代，礼堂成了集体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象征，“许许多多的单位都要盖礼堂，理由是需要在这里开会、做报告、演戏、开跳舞会……，于是礼堂

① 《虹口礼拜堂中国男女接亲》，《申报》1873年4月11日，第2版。

② 《结婚礼堂》，《京话日报》第2524号，1918年第3版。

③ 《会议府校善后办法》，《申报》1909年8月9日，第11版。

④ 《礼堂素描》，《逸经文史半月刊》第14期，1936年9月20日。

⑤ 吴兴吾：《市镇上宜设公共礼堂》，《申报》1922年11月3日第22版。

⑥ 《职教社之秋季评议会》，《申报》1928年10月24日第11版。

被称为‘政治工厂’或‘艺术工厂’。既是实现工业化时代的‘工厂’，而且跟神圣的政治和高尚的艺术联接……”^①特别是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时期，要求“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要建礼堂”，农村开始大规模建造礼堂。“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大礼堂（或大会堂）最终得以普及，在全国基本实现了村村有礼堂的基本目标。当时的礼堂不设座位，泥土地面。正前方设有主席台，它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并以大致统一的方式设置，两边是主席语录天天讲，背景是主席舵手放光芒。关于礼堂的描写，在庞超飞“共筑礼堂”、赵淑婷“礼堂新建”、周瑜倩“礼堂缘起”均可以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主席台的权力登峰造极，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革命成了当时“礼”的新概念。礼堂的主要活动除了批斗，还是批斗，极度发挥着政治工厂的作用。周瑜倩“政治记忆”、赵淑婷“多事之秋”、蔡蕾“批斗会”、庞超飞“阶级斗争”……那段记忆仍活跃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此外，还有一些由祠堂演变为学堂后又一度作为礼堂的，比如采写中，唐凝“礼堂改为小学”一文就详尽地叙述了这一过程；有专门为某些特殊活动而建立的，周瑜倩生动地描绘了“渔民大会”的种种，极具地域特色。改革开放以后，礼堂逐步转向于大众娱乐性、经济性或多功能用途，但更多的则是走向衰落。周瑜倩就有“消失的渔村文化”的相关描写。此外，还有鲁雁歌“盛衰变换，人民会场”、项淑玉“因何而存，因何而亡”，等等。

社会从政治重心到经济重心的转型，以及集体经济的式微，喧闹的礼堂变成荒寂空场。作为一个大而无当的建筑，大多被拆除。保留下来的，在农村又多变成仓库、厂房、学校，甚至牛棚，或干脆废弃、出售；在城市里则改造成舞厅兼溜冰场、餐馆或创意空间。还有极少的一些仍保留原有的会场、剧场功能，但豪华装修淹没了过去浓郁的政治味道。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因公共文化生活解体造成的乡村文化危机日益加深。因此，再次运用公共空间，建设公共文化生活，加强乡村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新农村建设迫在眉睫的事。“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从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重构入手，来实现公共文化生活的回归以及农民文化生

^① 郭小川：《堂皇的“停要待料”的“工厂”》，《针锋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活的新的整合，这样才可以推动农村文化发展、乡村记忆的延续以及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①

自 2013 年起，浙江省人民政府实施为期五年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将其列为省政府十件实事工程之一，争取五年内 50% 的行政村建有文化礼堂。三年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前，全省已建成文化礼堂约 4000 家，用以充实基层文化载体。这些礼堂形式多种多样：有以功能角度划分的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长效型还有综合型等；从性质角度看，大多具有纪念意义或者娱乐性质，也有一些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在已建成的文化礼堂中，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老祠堂、学堂、会堂等改建而成，有些则是新建的，但保留和利用了一些祠堂的功能。从乡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乡村文化礼堂建设是由旧式祠堂到文化礼堂的嬗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国家形式上利用乡村公共空间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在内容上则是注入优良的传统文化内核。随着文化礼堂的不断普及，新农村建设在内容上的创新也不断凸显——基于传统之“礼仪”，培育现代之“和谐”。

浙江省从建设乡村文化礼堂入手，为农民打造精神家园，让其在“身有所栖”后“心有所寄”。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为文化礼堂的建设做一些努力。但是，文化礼堂的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祠堂、学堂、礼堂，这三者并非在每一个乡村同时存在，有的地方只有其一二，有的则是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期历经了三者文化内涵的转变。无论是祠堂、学堂，抑或是礼堂，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属于空间上的建筑实体，单从这一点上看，想要在三者之间实现其特定功能的转换并不复杂。经验表明，相比于私人的空间，人们更善于变更公共空间的功用来满足公众的共同需求，这是最可能实现且阻力较小的一种方式。出于不同的时代需求或者困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善于变通的人们将祠堂的空间资源利用起来，将其打造成一个初具雏形的学堂，以此尽可能多地满足本区域内儿童受教育的需求，从祠堂到礼堂，从礼堂到学堂的变更大致也是如此。

例如在一些村子里，只有一座大建筑，也许它在那里屹立了近百年，经历了从祠堂到学堂再到礼堂的变迁，张琪的“冯氏宗祠”就历经了这个过程。虽然它的名称没有改变，但在这一过程中，该祠堂的实际功用发

^① 何兰萍：《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生了变迁。而有的村庄却不同，在 20 世纪初，村里的某处是“占据”着一所祠堂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祠堂坍塌、拆除了，学堂又兴起来，之后又有礼堂拔地而起取而代之。另外还存在一种现象：祠堂、学堂、礼堂并存于同一建筑物中，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既“自立门户”，有着区别于另外两者的特性；又“相辅相成”，都在乡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值得思考的是，在祠堂衰落之后，其原来所发挥的维护村落、宗族共同体的作用是否也随之消失了，还是继续由礼堂来替代它发挥着原有的作用呢？随着原本的村落共同体的衰落，自然村内生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我们的乡民又是如何来亲历这一巨大的转变，也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总之，不管是哪种现象，祠堂、学堂和礼堂都是它们所在乡村历史的见证，或兴盛繁荣，或饱经战火，抑或沧海桑田。

三

历史资料大致分为文献、实物与口述三大类，人们据此建构起对历史的认知。口述，它是通过实地访谈经历过“历史现场”的人，用文字笔录、录音录像等采录形成的史料，也是搜集、记录历史记忆的一种田野方法。它让历史更加丰富全面、更加接近真实。口述历史在当今历史叙述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当今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如何传承传统文化课题中意义巨大。

口述历史对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途径和训练工具。学生不仅要学习历史，还要有一份发现历史、记录历史的责任。每个人都有一双发现历史、观察历史的眼睛，但是由于忽视，轻视甚至漠视，许多人患上了“近视眼”“散光眼”的毛病，他们看到的历史是片面的，局限的，混沌的。而口述历史的学习就像是一面放大镜，通过对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亲身实践渐渐明晰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全貌是什么样的，成千上万和我们一样普通的人在历史中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其实，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什么大人物和小角色之分，有的只是角色上的差异，大人物有大人物波澜壮阔的丰功伟绩，小人物有小人物娓娓道来的生动故事。

在我们生活的家乡，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有很多祠堂、学堂、礼堂之类的建筑。学生带着初学的专业知识，独自去探寻这些“历史建筑”，发掘它们的故事和历史。这既是历史学习之学程，也是专业能力提升的过程。

口述历史能让高校文史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通过课外的基本训练及田野实践，初步掌握口述历史的技能与方法，从而培养面向社会文化发展所需的人才。使之成为文史专业培养中，学生喜欢、教师乐意、社会需要的一个基本学程。以口述历史为手段，从专业知识、学科技能与情感培育等方面提升学生基本素养。它将社会实践活动与在校的专业学习有机结合，将情感培育与专业成长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使其在成长中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本书是我们 2009 年以来的“20 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口述历史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三代人·六十年：20 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变迁》和《倾听·记录·传承：飘散而去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又一研究成果。

从祠堂、学堂、礼堂的兴衰历程中可以看出，20 世纪政治力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发展中的作用。它巧妙地借助公共空间这一特殊的场域以及人们在情感上对于公共空间所特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大化地引导乡土普通民众的生活、生产以及精神、信仰步上其既定的、合理的轨道。它有步骤、有计划，从政治出发，包揽经济、文化的全方位而有力地对基层社会进行改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乡村的剧变，人们从传统血缘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宗族社会（家族社会）迈入地域性的公民社会（或人民社会），从而使乡村社会向现代化方向迈进。

编著者于杭州仓前余杭塘河畔

2015 年 12 月 29 日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薪火相传	(1)
----------------	-----

1 东湖后堡：越地乡间的家族村社	(3)
2 高湖佛坛：内冯祠堂的族姓印迹	(28)
3 筱溪潺潺：郑氏宗祠和村子礼堂	(41)
4 三丰沧海：西蓍草庵与新民学堂	(54)
5 四明芦田：王氏家庙的绵延岁月	(64)
6 药山檐下：惠泽犹记，台门依稀	(74)
7 翰坂八都：项家祠堂，沧桑有迹	(84)
8 桐城暮雪：尤氏赵氏程氏三祠堂	(96)

第二编 云程发轫	(107)
----------------	-------

9 山阴安昌：繁盛水乡的娄氏宗祠	(109)
10 赤川溪口：余氏家厅的古闻昔颜	(119)
11 泗门塘河：文风善行，亘古不变	(129)
12 女埠渡渚：章氏门檐的明清家庙	(141)
13 太平温峤：戴氏祠堂的新旧繁华	(154)
14 田市李宅：耕读传家的山溪村落	(166)
15 腾桥黄堂：临川乡村的祠庙崇拜	(176)
16 桑庄鲁营：鲁氏祠堂与人民会堂	(186)

第三编 春祈秋报	(197)
----------------	-------

17 彩烟山中：樟花梁氏的新老祠堂	(199)
-------------------------	-------

18	凤山龙湖：赵氏祠堂的文化映象	(212)
19	临浦柏山：树德堂陈的百年昌盛	(221)
20	渔山葛村：葛氏祠堂的风雨历程	(230)
21	鲁山赵楼：娓娓道来的杨程故事	(243)
22	桂川樺溪：大山深处的孔氏家庙	(253)
23	龙川巧塘：卢氏长老述岁月远歌	(266)
24	青水坡兜：黄氏祠堂的默默守望	(279)
 第四编 风雨怀人		(291)
25	五龙黄沙：海岛渔村的丰收礼堂	(293)
26	双岗头上：翁家祠堂及其小古顺	(304)
27	临浦大庄：花甲书记的一二三事	(318)
28	木香石井：记忆深处的樟木礼堂	(328)
29	东洲上沙：余氏祠堂的新旧起落	(340)
30	枫泾咸水：杨氏宗祠与海瑞祠堂	(349)
31	塘栖朱角：大运河畔的人民会堂	(361)
32	黄岩坦前：王氏孤儿的沧桑岁月	(370)
 第五编 隆替兴古		(379)
33	天台妙山：陈氏名门之诗书礼武	(381)
34	大慈狮山：溪东童氏及其余庆堂	(399)
35	畝田乔山：蒋氏宗祠与名人学堂	(411)
36	瓜沥航坞：百年树孝，北施流芳	(422)
37	义亭尚湖：金桂树下话胡氏往昔	(434)
38	银湖白沙：银杏树下的华封堂事	(445)
39	梅川孙境：孙氏古脉，慈孝绵长	(458)
40	普门拜圣：张璁祖祠传先贤遗风	(471)
 后记		(482)